

秩序的固化与失控

坚固的形式构成了东方帝国的华丽的大厦,但是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个体仍然只是一种偶然

回望



《永乐帝》
[日]檀上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

中国是一个很讲究“秩序”的国家。学者葛兆光曾经指出,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大地仿佛一个回字形,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

日本史学家檀上宽的《永乐帝》,并非个人传记,对于众所周知的朱棣篡位前后的事件只作简略叙述,主要围绕朱棣的活动轨迹,将之与明朝的制度建设、文化思想相融合,以研究华夏秩序在明朝完成的过程。永乐帝只是个切入点,而在说永乐帝之前,作者花了不少笔墨讲述明太祖的统治措施,朱元璋一手打造的明朝体制,其目的就在于让政治秩序固定化,让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

作者说,作为历代中华帝国存在依据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发展到明朝初期,造就出少有匹敌的专制国家。明朝对内推行皇权专制统治民众,对外建立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规范周边诸国。大明皇帝以天下秩序与华夷秩序交叉构建起统辖中华与蛮夷的世界体系。它既反映了历经元末混乱创立的明朝在恢复政治秩序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专制程度不断强化的体制性归结。

朱棣的上位颇为可疑,所以他的神经特别敏感,谁也不能碰触他的逆鳞。檀上宽并不停留于控诉朱棣的残虐暴行,他认为永乐帝拉拢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方孝孺,是出于谋求自己皇位正统性的政治意图,因此他对此事的研究蔓延至明初知识分子对秩序的维护。

檀上宽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永乐帝对朝贡制度的执着。“永乐帝在外政上最终达到的,是在四夷朝贡的盛世表面下所包含的复兴国际秩序的实质。”作为日本东洋史专家,檀上宽对于中日韩多角互动格局相当关注。明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就是从洪武时期至永乐时期建立并完善的海禁-朝贡体制。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借助郑和下西洋等行为,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亚洲全域。把“亚洲”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这一直是日本史学界的一个研究重心。我们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在思想文化上互为背景与资源,但日本史学界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对亚洲秩序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格外关注,是否也隐含着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思想呢?当檀上宽在阐述明成祖的“大中华思想”时,其中是不是也隐现着“大日本主义”的魅影呢?

虽然永乐帝竭力想要再次缔造另一个天下大国,但中国世界地位和控制力的下降渐成历史趋势。黑格尔说18世纪的中国:“坚固的形式构成了东方帝国的华丽的大厦,我们在其中能找到所有理性的法令与安排;但是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个体仍然只是一种偶然。”这句话可提前适用于15世纪的永乐王朝,同样可以推后适用于20世纪的日本和德国。而对于21世纪而言,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秩序,如何处理好“我-他”关系的诸种变化,是每一个国家都要小心应对的课题。 赵青新

城里人也有乡愁

我们都有共同的追忆、怀想、爱情,共同的悲欣底色……

憾



《上海之妖》
朱蕊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8月

闲读朱蕊女士《上海之妖》之《闺中情思谁人知》,打了一个激灵:分处两个世界的人,也会“凄苦无奈又如出一辙”?非如阁下所想,此处是我对贵与贱的爱情有甚感慨,而是突然“无端地想起”另外两组人,我将民女芸娘置换做了乡下人,将贵妇黄娥想象成了城里人。“凄苦无奈”,城里人也会有这种情绪?“喜怒哀乐”,城里人也会有的?小时候总是臆想城里人是另外世界的,她们不仅模样服饰目测便不同,而且其情感结构定然迥异。

别笑话。十多年前,我到了县城工作,与已在小城工作多年的女同学走在街头,她突然停下来,指着一栋楼,抬头望,往上数,数楼层:七楼那户人家,有女孩嫁到上海。县城女子嫁到上海,便是新闻,若是县城男人娶了个上海女子,那不是天大新闻?

我时不时拿起《上海之妖》翻读,我估计我心底依然存在乡下人对城里人的曼妙想象。作者朱蕊是阿拉上海人,生在上海,负笈京都,复居上海,一直都在大城市,恰好可以满足乡下人好奇。“有时想想,上海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纵便是文革期间,别处封资修都扫荡净尽,“上海还保留了那么几家西餐馆:红房子、德大、东海、凯司令、淮海西餐社以及天鹅阁,天鹅阁是葡国风味的,那里做的葡国鸡极正宗”(《美丽的红绿白》)。

“当一个人说自己是某个地方的人时,他就与这个地方再也割舍不了关系了……这种强有力的联系,这种一个地方所赋予你的意义,应该称作什么?家园还是故乡?”若说慢生活在乡下都难再现,让我们愁从中来,不可断绝;上海这样所谓日新月异之地,更易物是人非。“就是黄浦江那个优美无比的弯曲,她恰到好处地画出了上海的曲线,像上海的一握柳腰,该丰腴的丰腴,该苗条的苗条……”此地虽成城,却也是心底的故乡记忆,“仿佛是突然间事,某一日,我站在我们办公楼的顶层咖啡厅,望向外滩……对面陆家嘴不知何时耸立起了那么多个性鲜明的建筑,一下子竟认不出来了”(《上海之妖》)。

我们回到家乡,见茅檐低小,锈迹铁锁,心底无端升起乡愁;朱蕊站在城顶,见外滩之腰,陆家嘴起了新楼,建筑妖娆,她心底无端升起了一段城愁?若说乡村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城市更是“一变局”便是“数千年”;居城市者,对世道人心之变局,感慨更大于乡村人。朱蕊准确地拨动了我们这些所谓城市人内心深处对过往岁月的缠绵情意,牵动了不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对世事与世界变动不居的既矛盾且难的难解情绪。

“抵达才是出发的理想”,这笔搁向玄远,到底还是指向我们内心。出了洋的女儿,视频聊天,“她突然会说,很想念你们食堂的‘鞋底板’(一种形状类似鞋底的酥饼)啊”,美食抵达家园,以味道抵达童年,“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解放食堂的美味几乎代替了‘妈妈的手艺’”,这不也是“东海西海,心里攸同”?这不也是“城里乡里,情感相通”?

我们都有共同的追忆、怀想、爱情,共同的悲欣底色……这诸多共同,姑且叫人之元愁吧——乡下人有乡下人的乡愁,城里人也有城里人的乡愁。《上海之妖》,给我们展现的是别样风味的城愁。 刘诚龙

世界史是中国史的镜子

中华历史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与周边历史在相互抵触与排斥中逐渐走向包容融合的过程

憾



《中华帝国史》
[法]勒内·格鲁塞 著
新华出版社
2016年3月

自近代以降,以各种视角剖析源远流长中华历史的文章或书籍汗牛充栋,其中并不乏优秀之作。格鲁塞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站在一般学者习以为常的中国历史沿革角度就史论史,而是将中华历史搬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舞台,反复对照。

秦始皇是每位研究中华历史学者少不了大书特书的关键人物。格鲁塞在铺陈秦始皇的历史时,很自然将他与百多年后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相提并论。还别说,如此对照,二人的雷同之处顿时一目了然: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完成了统一,恺撒则是罗马大帝国的奠基者。汉武帝在位的53年,也是马略和苏拉确立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支配权的时代,格鲁塞于是调侃,“武帝的军队在中亚和东亚建立了‘中国治下的和平’,这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在远东之对等物”。与一般学者更关注丝绸之路古迹的发掘有所不同,格鲁塞擅长从历史文化包括民间故事中寻找信息。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中国丝绸传入罗马后身价陡增,并迅速引领时尚,为此,罗马第二任皇帝提比略不得不制定反奢侈禁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服装,以保证对女性的充足供应”。这一点有点像当年绿茶在英国贵族阶层流行一天,罗马街头的丝绸,多少有点像是今天百胜望而却步的奢侈品……

除了简单的人物与事件的对接,格鲁塞喜欢站在更为高远的角度冷静审视中华历史的发展变迁。作为一名曾担任法国博物馆副馆长的学者,格鲁塞对中国学术、宗教、诗歌、雕塑、绘画、陶瓷等有过深入的研究,并擅长从这些文化史料和考古结论中分析出令人惊叹的信息。在解读汉武帝开疆拓土布局中国版图、穿插介绍卫青、霍去病等汉代著名英雄人物同时,格鲁塞着重提到了影响战局的一个关键细节——战马。他通过对汉代浮雕进行分析,发现“风格更接近希腊的战马”,因此他得出结论,汉代的马匹“正是公元前102年从河中引进的”。这实际表明,汉代中国与希腊有着比较深入的交流。

如果说前面只是中华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些耦合,那么丝绸和马匹这些信息元素则充分表明,中华历史与世界历史至少在民间已经有着较为深入的联系。而每当国力强盛之时,往往也是中国历史朝代对外经济交流发展相对旺盛的时期,比如佛教的引进。有人也许会立马想到南宋,其实南宋并未游离于这一结论之外。南宋最后虽然被元朝击败,但并不表明南宋的羸弱。相反,南宋文化艺术发展高度折射当时国家发展的欣欣向荣。当然,这种繁盛是从汉人历史纵向角度对比,并不单纯以军事实力作为比较对象。另一个有力证据是,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下西洋,恰值明朝国力最为强盛之时。

格鲁塞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并不仅仅限于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世界历史,也有助于国外读者透过本书认识中国历史。其实,细读格鲁塞的文字,我们还会发现其中隐含着这样的宏大命题,即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一脉的中华历史,其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与周边历史在相互抵触与排斥中逐渐走向包容融合的过程,哪怕是历史长河中的那些刀光剑影,也未能挡住历史向前的滚滚车轮。 几又